



世纪文库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撰.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4(2009.2重印)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978-7-5325-4324-3

I. 中… II. 蒋… III. 中国-近代史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3819号

责任编辑 谷玉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撰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mm 1/16
印张 9.25
插页 4
字数 129 000
版次 2006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2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5325-4324-3/K·826
定价 14.00元

中国近代史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中国近代史

前 言

现在的青年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

[1]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收录了1822年（清道光二年）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外交涉的重要文献共799篇。1931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卷，1934年11月出版中卷。下卷未见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9年、1970年分别再版上、中卷，也未见出版下卷。估计蒋廷黻在1935年弃学从政后，已无时间与精力编完下卷。

国近代史》。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蒋廷黻有过长期的从政经历，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所以这本著作在解放后曾多遭非议。但是，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诚如陈旭麓师在此书被湖南岳麓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写的《重印前言》里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1]。现在，“存其文”已经做到，“原其人”则有待努力。考虑到大家对蒋廷黻知之不多，这篇“导读”就多写点蒋廷黻其人；进而论蒋廷黻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以有助于大家“知人论世”；第三部分，从近代通史体系的发展变化角度，进一步说明蒋著《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地位和近代通史的研究现状，以加深对蒋廷黻学术成就的理解。

一、 蒋廷黻其人

1 留美洋博士

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1] 陈旭麓：《重印前言》，《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

蒋家从他的祖父时代起，就务农兼经商，在靖港开了一家经营铁器的店铺，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看管^[1]。祖父死后，留下一个店铺和12亩田地。三个儿子连同老娘各分得三亩，店铺则由三兄弟各占一份^[2]。由于他的大伯父是个抽鸦片的瘾君子^[3]，所以靖港的店铺仍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掌管。

蒋廷黻说他的父亲“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晚年做过靖港的商会会长，在家乡常为邻居“排难解纷”^[4]。但对蒋廷黻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的二伯父。如果没有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那么他早已被父亲弄到店里去当学徒了^[5]。

[1] [4] 蒋廷黻口述、谢钟琿译：《蒋廷黻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第一章：《我的先人和老家》，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该回忆录是蒋廷黻于1965年退休后，应美国哥伦比亚“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邀，口述生平经历的总结。原稿系英文。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从哥大购得英文原稿，约请谢钟琿译成中文，在该杂志分期连载，并于1979年出版单行本。

蒋廷黻传记，迄今为止惟有陈之迈著《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书，但写得过于简略，这使我在写作本文时深感棘手。幸好有他的回忆录可资利用，才多少感到踏实点。这也是本文在涉及蒋廷黻经历及家世等时，经常使用《回忆录》及陈之迈《志事与平生》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能做中国文化人的口述历史，真是件大好事。类似蒋廷黻这样的《回忆录》，还有《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据唐德刚先生说，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曾访问中国名流十余人，“因为受访者的教育背景、工作习惯、故事内容均各有不同，加以受派前往工作的访问人员的教育背景亦悬殊甚大，所以各个人的‘口述历史’的撰录经过也人人不同。其中纯洋式的则采取西人‘口授’（dictation）的方式；纯中国式的，则几乎采取一般茶余酒后的聊天方式。介于二者之间的，则往往是受访者以中文口述，访问人员直接以英文撰稿。”（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三章第[12]注释，华东师大版第46—47页）

三年前，笔者与复旦历史系若干同仁通过余子道教授的联络，也曾接受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委托，做过中国现代史上的几个课题，如《日伪时期上海的“跑单帮”》等。采取的方法是请当事者座谈、同步录音，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中文，并作该专题的中文历史报告（有如座谈会综述）。完成后即将座谈会录音带、音带的中文整理稿及综述报告都交给了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1996年，笔者参加在广东召开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见到吴相湘教授时，吴老先生希望复旦历史系继续参与这项工作。

[2] 《回忆录》第二章：《家人和邻居》，第11页。

[3] 蒋廷黻说：“大伯父为人很文弱。他早年就吸鸦片烟。我常看到他一榻横陈，喷云吐雾。”（见《回忆录》第一章，第6页）

[5] 蒋在《回忆录》中说：“家父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职业，因为经商可以过正经而快乐的生活。如果他说话能算数的话，他就会要我哥哥和我到店里去当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第一章，第5页）

蒋廷黻的母亲姓熊，外祖父是个穷秀才。母亲在他6岁时患病去世。不久，父亲续弦。据蒋廷黻说，继母对他和哥哥“照顾的无微不至”，是位好主妇、好母亲^[1]。他幼年失怙，父亲又常年在外，有个好继母照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蒋廷黻4岁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2]。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那年，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二伯父决定让侄子进新式学堂^[3]。1906年初，11岁的蒋廷黻到省城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接触新学，学习英文。1911年（宣统三年），因辛亥革命爆发，益智停办而辍学。最后一学年，他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4]。

在教会学校那几年，正是晚清政局动荡、新潮勃发的年代。湖南虽属内地，却颇得风气之先。立宪请愿、收回利权、新政办学、派遣留学生，都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也通过新式书报不胫而走^[5]。蒋廷黻身处其间，又在美国人办的学堂里读书，耳闻目染，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学的打算。1912年，他在征得益智学堂校长

[1] 蒋的继母是位寡妇，娘家颇富有。嫁过来后曾生过一个女孩，3岁时夭折了。蒋对继母的称颂在第三章中有好几段内容。

[2]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3] 事见《回忆录》第四章：《新学校、新世界》，第27页。蒋的二伯父十分了得，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比蒋的父亲更见多识广，也更关心侄辈的功名。没有二伯父对蒋学业的关注，蒋廷黻不可能有今后的发展，充其量只能进私塾读点书后终老乡里。

[4] 蒋廷黻加入基督教，并非因为宗教狂热，而是有感于教徒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忱关怀。他在《回忆录》中说过自己做基督徒的经过：“我应该再补充一下，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念书时的最后一段生活。信基督教的问题我是从未考虑过。我当时十六岁，对基督教的教义知道得很少，而且成为基督徒的倾向也很小。但我在湘潭参加长老会的聚会已有五年之久。凯卜勒博士、杜克尔博士、温德堡博士（沈案：凯卜勒是位传教士，后两人是湘潭长老会医院的医生），特别是林格尔夫妇，他们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想一个对人类深具影响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经过这一番推理，我最终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经过。”（《回忆录》第五章：《教会学校时期》，第43—44页）

[5] 《回忆录》第五章，第38页。

太太、也是他的英文、历史教师林格尔夫人同意之后^[1]，凑了点钱，就只身到美国去了^[2]。这一年他17岁。

到美国后，因为带的钱不多，便进了密苏里的一所半工半读的派克学堂(Park Academy, Parkville, Missouri)读中学。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学堂，兄弟俩仍靠半工半读维持。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将近三年的半工半读生涯，不仅使他锻炼了意志和强壮了身体^[3]，而且使初到美国的他，对美国人民在他大病时所给予的真诚关怀终生难忘^[4]。

1914—1918年，蒋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 Oberlin, Ohio)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蒋廷黻在大学里主修历史学，同时也选读多门自然科学课程^[5]。当时，他已对祖国国内的军阀纷争

[1] 蒋廷黻自述去美留学的想法，有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林格尔夫人对学生们说，恐怕革命后要有一段混乱时期，为了安全，她决定关闭学校。她要我们暂时回家，她也要暂返美国。当时我才十六岁，如果说参加革命，又太年轻，如果说静止不动，又嫌太大。我当时回忆麦尔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我想：难道说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静待革命过去才读书吗？不，这样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随林格尔夫人到美国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我认为我的想法妙极了。当我告诉林格尔夫人我的想法时，她问我：‘你家人同意你随我到美国去吗？他们能供给你必需的费用吗？’我非常高兴她这一问，因为这说明她同意我的计划。”（第五章，第42—43页）这段文字的费解在于他赴美留学和当时的中国革命有何关系没有说清楚。从字面意义看，好像他怕革命从动乱到成功的时间太长，迫不得已才去美国读书的。其实是，他在教会学校中对美国早已有强烈向往。正如费正清所说：“在实际进程中他终于美国化了。他的老师，即林格尔夫人(Mrs. Jean Lingle)，几乎成为他的养母，他也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怀着极为强烈向往西方的愿望。”（[美]费正清著、陆慧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既然是早已向往去美，为什么又要与辛亥革命乃至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扯在一起呢？我们当然不敢说他隐瞒了原始思想，但至少可以说回忆录常常会有太理性化的特点。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大段原文放在注释里而不作正文的原因。

[2] 蒋廷黻去美经费是从靖港的店铺中向二堂兄借的。从《回忆录》的叙述内容看，他去美国并没有告诉父亲与二伯父。最初，他和林格尔夫人一起从湘潭顺流而下到上海。但到上海后，林格尔夫人突然变卦，不再返回美国而要回湘潭继续办学，并要蒋同回湘潭。蒋当时认为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不能半途而废，“不论林格尔夫人回不回湘潭，我都要去美国”。于是在林格尔夫人安排下，他从上海出发，只身赴美。以上均见《回忆录》第五章。

[3] 《回忆录》第六章：《留美初期》，第54页。

[4] 他的女儿蒋寿仁在《欣慰与回忆》一文中写道：“我在纽约读大学时，父亲常回忆他在美国读书的情形。他初到美国，在一个小城的中学半工半读，一切没上轨道，就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候，他英文会话还有困难，又没有钱，是小城的社会力量照顾了他，因此父亲很看重他们，这也是父亲在青少年时代对基督教教义发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见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98页。）

[5] 蒋廷黻在大学期间修过化学、生物学、植物学以及心理学、进化论等课程。

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希望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1]。由于历史系的教学枯燥乏味、课程内容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2]。这对他日后希望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努力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史观的确立，有重要影响。

大学时代，蒋廷黻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自然学科的教授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要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结论客观^[3]。这种训练使他终身受用。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

欧柏林学院的宗教气氛十分浓重。蒋廷黻虽然是个基督徒，但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对美国教会丑化中国人十分反感^[4]。基于民族自尊的爱国情感，使他“对整个教会活动感到怀疑”，甚至认为传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5]。所以，在整个大学时代乃至日后的行动中，他只把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慰藉，并不执着于宗教教义的追求和宗

[1] 《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页。

[2] 《回忆录》第七章，第62—63页。俾斯麦(1815—1898)，德国政治家，曾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首相。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参与镇压巴黎公社。推行大陆政策，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1890年去职。著有《回忆录》。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和意大利王国首相。1855年联合英、法、土耳其发动抗击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又联合法国发动对奥战争，收复伦巴第，但又将尼斯等地割让法国，换取意大利北部的统一。1861年合并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成立意大利王国。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早年曾加入“烧炭党”，后被驱逐出国。1831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策划并领导1848年意大利革命，成为1849年罗马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意大利革命失败后，仍积极为意大利统一而坚持斗争，并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的远征。著有《论人的义务》等。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早年当过海员。参加过“意大利青年党”。1834年起义失败后流亡南美，参加巴西共和党人起义和维护乌拉圭独立的战斗。1848年回国后领导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斗争。1860年率领“红衫军”解放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后将两地与撒丁王国合并。曾两度组织反对教皇统治罗马的军事斗争，都告失败。著有《加里波第自传》。

[3] 《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59页。

[4] [5] 《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63页。

教仪式上的顶礼膜拜。他坚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1]，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力主用科学技术为祖国服务的观点^[2]。

蒋廷黻的大学时代，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战争期间，他的立场是“亲西方”的。他站在协约国一边，对美国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国际关系中民族自决、国无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等的十四点宣言，十分赞赏。他说“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以为真”^[3]。直到后来“巴黎和会”议决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时，他在吃惊之余，对威尔逊有了怀疑^[4]。不过，他怀疑威尔逊而不怀疑美国政府^[5]，他的亲西方倾向并不因威尔逊背叛诺言而破解。

1918年蒋廷黻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立即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去为在法军中服役的大批华工服务^[6]。期间，还经常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保持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思考代表团拒绝和约将对国内学运、政情产生的影响^[7]。他的亲西方倾向没有泯灭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

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1] 《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63页。

[2] 欧柏林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人有20多名，在当时算是留学生较多的学校。蒋廷黻说：“在欧柏林的其他中国学生，大部分均较我年长，中文也较我好，但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实验室工作困难。”（见《回忆录》第七章，第60页）

[3] 《回忆录》第八章：《赴法插曲》，第65页。

[4] [5] 蒋廷黻说：“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又说：“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均见《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前一句是他对威尔逊的怀疑，后一句明显是为美国政府的弱肉强食外交辩护。

[6] 1917年北洋政府决定参战后，按照与协约国达成的一项协议，招募了十五万劳工前往法国，有的在兵工厂工作，有的配属盟军担任兵工。其中隶属于英军的有十万人，法军的有四万人，美军的有一万人。蒋廷黻加入由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哥伦比亚骑士队”，到法国战地中国劳工营中去鼓励士气。

[7] 《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蒋廷黻在巴黎期间，国内已经发生“五四运动”。对此，蒋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也未作评论。

进哥大之初，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所以进了新闻学院。不久，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最后，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1]，师从著名的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 H. Hayes)。

海斯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2]的弟子，而哥伦比亚大学正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鲁滨逊在哥大执教长达25年，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布美国各个大学，其中如毕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都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界的知名人物。这个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他们认为人类以往的一切活动都应包含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历史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广泛的学问，因此必须对旧史学只讲王朝兴替、军事征战、外交阴谋乃至宫闱丑闻等局限于政治史的传统进行无情挑战；历史发展不只是政治因素一种动因，而是有着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的运动，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作综合性多学科性研究；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学家应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这是“新史学”的“基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3]。

[1] 《回忆录》第九章：《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第73—74页。

[2] 詹姆斯·鲁滨逊(1863—1936)，毕业于哈佛大学。1890年在德国弗赖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德期间深受该国“新史学”思潮影响，回美国后竭力宣传“新史学”主张，成为美国“新史学派”开山祖。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89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后又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19年，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编辑《美国历史评论》杂志。著有《西欧历史导论》、《文明的考验》，编有《新史学》论文集等。其中《新史学》一书，我国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中译本。蒋廷黻就读哥大时，他正忙于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所以没有能听他的课。

[3] 关于美国“新史学”派的基本主张，可以参见张广智教授的著作《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蒋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仅受到了“新史学”的熏染，而且直接受到了导师海斯教授的影响。

从蒋廷黻后来的研究实践看，他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注意于“新史学”强调的史学垂训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他所写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近代史知识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导师海斯，当时在哥大主讲“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并致力于“族国主义”研究。海斯教授这门课，强调工业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主张在工业革命后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社会里，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对生产进行干预而不应放任；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经完全不适用。要干预就需要社会立法。海斯认为德国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非常高明的^[1]。这对蒋廷黻有很大启发。后来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再强调使用机器生产对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并对洋务运动作了积极评价。

所谓“族国主义”^[2]，就是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趋向，成了注重史学社会功能的美国“新史学”派史学家研究的时髦课题。他们探究这类国家所揭橥的民族主义是怎样的一种理论构架，采用什么方法争取民族独立，独立后用什么方法治理国家，对世界原有的政治格局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蒋廷黻作为海斯的学生，又是来自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对这一历史动向和海斯的研究工作，自然有所感悟与兴趣。后来，他在这本《中国近代史》的“总论”里，把中国能否走出“中古”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作为全书的立论主题，显然渊源于此。他写道：

[1] 《回忆录》第九章，第78页。

[2] 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总论》；另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7页。